新质生产力下少儿出版的“AI+”赋能

■林 欣（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以AI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应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之一。当前，少儿出版已由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内卷加剧，危机感增强，所以应该积极对接高科技，以“AI+出版”策略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抓手，为少儿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和营销的突围解困探索新路。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出版创新突破

近20年来，少儿图书市场一直是中国图书零售市场中发展最快速的板块，也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图书细分市场之一。然而，随着新生人口下降、同质化竞争加剧、盗版泛滥、流量为王带来的营销成本居高不下等诸多市场环境的持续变化，少儿出版的库存与风险加大、利润不断被压缩，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聚焦新质生产力理论，探寻业态激变期少儿出版业转型之路，开启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乃当务之急。

近年来以AI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应用得到了爆发式增长，特别是自2022年ChatGPT推出以来，Claude、文心一言、盘古、通义等国内外各种数据大模型应用纷纷登场，在文本、图像、语音生成等方面的应用探索对传统出版将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少儿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该置于技术革命的大视野下，勇于“破圈”，推动产业尽快加入实体和数字融合共生的新业态，找准发力点，创造新利基。眼下，从出版社到民营策划公司都在积极探索AI在内容策划、编辑加工、发行营销等出版发行各环节的应用，并且已经有了一批应用AI技术参与编辑设计的产品面市，初步验证了AI在出版业应用的可行性。

少儿出版领域的AI赋能

少儿类图书因其读者对象的特点，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大量的出版编辑工作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卷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在图书市场整体负增长的情况下，作为市场最大板块的少儿类图书占比依然高达29.17%，而2024年1~8月少儿类新书出版达1.4万种。大量的出版需求意味着出版社面对如何做到精准选题策划、如何提高大量的插图设计及文字创作效率、如何选择适销对路的发行营销方式等诸多难题，AI应用对出版的各环节赋能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各种AI应用软件的开发，AI在出版选题策划、内容撰写、美术设计、编辑加工、校对审核、版权管理、营销发行、数字音视频融合等出版全产业链进行赋能有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AI技术在图书策划层面扮演重要角色

选题策划是图书出版流程的源头，它指明了出版的方向、营销的重点和预期实现的价值。

首先，AI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分析大量的市场和行业数据，根据读者的阅读历史和喜好，洞察其潜在需求，生成用户画像，为童书策划编辑提供读者感兴趣的热点选题，或预测未来潜在的高价值话题。

其次，AI同时可以帮助编辑构建图书框架和内容方向，辅助生成图书简介、宣传与推广文案。

再次，AI还可以辅助规划重点营销群体及其营销方式，并寻找与之适配的发行渠道。基于AI数据分析辅助形成的选题策划方案，为后续的出版各流程明确了工作方向，有助于出版社提高有效出版比例，实现高效出版。

AI技术对出版内容生产的影响

随着AI应用软件的快速迭代，AI技术对出版内容生产的影响颇为深远，涉及个性化文本、图画内容生成、润色校对等多个层面。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从2023年开始在内容制作方面实施AI应用的积极尝试，陆续策划出版了应用AI技术的《森林画报》《宝宝绘本字典》等系列图书，并以其较高的AI完成度和优质的内容，得到了市场的接纳和读者的欢迎，《森林画报》上市半年多来销售已突破5万册。

在基础文本创作、润色及自动校对方面，使用ChatGPT、Grammarly、Ginger、文心一言等基于AI的工具，帮助编辑生成基础文本、检测文字中的语病及拼写错误，甚至在风格层面提供建议，确保文字的易读性与规范性。而黑马、方正审校、蜜度等校对软件的应用，减轻编辑和校对人员的基础工作量，特别是书中注音部分涉及拼音的规范使用，AI软件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差错率。

除了绘本、漫画等以原创图为主的图书之外，童书往往需要根据文本配上大量的插图，在绘画生成方面，逐渐成熟的AI绘画生成软件有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DALL·E等，能够根据输入的插画模型和要求生成各种风格相对统一的插画，供美编进一步编辑修改，节约了大量的基础绘画和上色时间。

在图书版式设计和排版领域，AI软件能够提供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帮助设计师和创作者提高效率和质量。Canva、DesignCap、Adobe Spark等基于AI的图像处理和版式设计软件，除了内置多种设计模板外，还可以自动调整图文布局、优化版面设计，在图书内文排版、海报、PPT等平面设计上提供高效的智能设计辅助。

童书因其读者对象的年龄特征，往往在文本形态之外附加了音视频等延伸内容，在内容音视频生成方面，TTSMaker、讯飞智作等AI软件能够根据文本，模拟不同情感状态，生成个性化的音频，成为有声书或图书配套音频。在文生视频领域，OpenAI发布的AI大模型Sora可以根据用户的文本提示创建最长60秒的逼真视频，在图书宣传短视频制作方面有着积极的价值。

在数字化出版方面，AI应用可以涵盖从原始内容创作到最终形态发布的全过程，经过AI在创建内容、翻译、文本润色、排版、校对、生成音视频等方面的辅助应用，以电子书、音视频读物等形态存在的数字化阅读产品，可以在AI的辅助下精准触达潜在的数字化阅读需求的兴趣读者，并以其高效率、低成本、多形态的独特优势成为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的高效工具。

AI的应用能够在基础性的文本、插画创作及编辑方面给编辑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特别是在规律性文本、连续性插画等重复性工作上能够大幅提高效率，节约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降低成本。但在目前，因少儿读者阅读认知能力的特殊性，我们仍然需要看到AI的文案生成在适配儿童阅读的文本深度和人文关怀层面仍需要策划编辑的后期介入。

AI让图书营销发行更加精准高效

高效的图书营销发行工作要有精准的营销定位，同传统的多渠道多领域同步营销发行模式不同，AI技术能够充分、科学地分析市场数据和消费者行为，基于这些数据，出版社可以制定符合内容的出版营销策略，从而针对童书消费的父母及儿童等目标人群进行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推荐，这种精准营销不仅提高了营销效果和销售转化率，还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和与出版社的黏合性。

AI可提供发行营销渠道建议并自动生成营销素材。智能定价和库存管理，有助于提高图书的销售利润和市场竞争力。还可提升客户服务质量，降低人工服务的成本。同时AI技术还能够通过分析用户的反馈和投诉数据，为前端的选题策划和内容生产提供优化建议。

能力重塑拥抱AI出版

出版产业在数字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下，需要大量战略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来推动持续创新，重塑产业生态。新型出版人才不仅要掌握传统出版的专业技能，还要能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工具以满足行业蜕变发展的需求，他们的劳动对象由单纯的文字或图书，转变为多元融合的数字化产品和大量数据信息，其劳动工具不再是传统工具而是各种新型应用技术，他们在更加丰富多元的工作场域创造性劳动，为出版行业开辟新的生存空间。AI赋能下，少儿出版作为最有活力的板块，更要在加强内部培训的同时，积极引进具有人工智能技术和出版经验的人才，提高员工数字化的素养和创作能力，积极探索AI在出版发行全流程的应用。

在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熟的今天，出版从业者特别是管理者应正视人工智能浪潮对生产过程的不可逆的影响，“AI+出版”时代，并不是以AI代替编辑，而是通过人机合作提高基础性、重复性工作的效率，让编辑腾出更多时间从事选题的创新性规划，让营销人员加深对读者心理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把握。积极拥抱人工智能，首先要在思想上接纳，同时积极主动了解AI应用及其发展动态，在AI硬件、软件上进行必要的投入，在编辑、美编、校对、发行营销各出版流程对员工进行AI软件应用的培训。其次要鼓励从传统编辑出版流程的部分环节开始进行积极地探索应用，让“AI+出版”时代的编辑和发行们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数字编辑工具、市场分析工具，在实践应用中总结积累经验，塑造AI应用能力。

AI在出版的应用初期会有一定的投入，会遇到困难障碍，短期内效率可能未明显提升，但随着经验的积累，技术的不断迭代，AI的应用一定会大大提高出版的水平和效率。在AI工具的帮助下，出版者可以更精准地捕捉读者兴趣、预测市场走向并据此策划内容选题，高效生成或加工文本、图片，匹配最佳的销售渠道并生成优质的营销素材，甚至智能生成数字化音视频，从而高效打造纸数一体的多元阅读产品，为读者创造全方位、多感官的阅读新体验。

AI的赋能让我们站在出版变革的路口不再迷茫，技术与内容、市场的紧密结合赋予出版业前所未有的高效和更加广阔的前景，我们要在牢记出版使命的同时拥抱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出版业的持续创新发展。

精品精荐

生态、技术与人类解放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 自然和技术思想

○刘晓军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英]莱纳·格伦德曼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版/78.00元/ISBN：9787100241526

关于环境与生态这个重要议题，生态中心论已然处于强势地位，影响乃至支配着众多学科的生态话语；甚至马克思主义阵营也不乏学者在批评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时，向流行的生态模式靠拢。然而一个毋庸讳言的现实是，生态中心观的理论缺陷不仅让它难以有效地指导生态实践，反而造成了许多现实矛盾。这必然呼唤更深入的理论反省和思维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这本书，就是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重新发掘理论资源，结合当代社会理论以试图把握生态问题的经典论著。

国内外学术界对莱纳·格伦德曼的评论大多集中于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证，即对人类“控制自然”正当性的辩护。但强烈地剖析和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内部不自洽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反拨，而是为重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确立地平。众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生态问题是缺乏关联的，正如吉登斯曾经“批评”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了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作者在文中的一句话，回答说：马克思对于生态问题“并非没有论及，只是表述得比较含蓄”。只要脱掉“正统”解读的紧身衣，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就会在我们眼前逐渐清晰，并提供极大的帮助。该书给我们最大的惊喜恰恰在于，作者并没有简单截取马克思对自然或环境问题的零散论述，以当代生态学知识审视之后得出所谓“马克思思想中已含有生态学萌芽”的结论；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之结论与方法生搬硬套到生态学领域，重复一种资本批判视域下的生态问题解读；而是从当代生态问题的诸现象入手，以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作为理论起点，以当代技术分析和系统理论为方法，不但为揭示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本成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一次技术异化理论的重建与拓展之尝试。

对历经40余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首次进入大众视野的重大生态问题或许是10年前弥漫全国的雾霾天气，传统化石能源、粗放式的工业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而在全球范围内，从“八大公害事件”，臭氧层空洞到切尔诺贝利、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重大核污染事故中，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人们普遍期待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可能是直接性的亲近，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多是通过现代技术这个中介实现的，并且技术也是现实中所有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直接条件——无论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原始技术还是当代科学与工程学指导下的所谓先进技术。且（在作者彼时的实证观察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技术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技术。

正因如此，相比传统解读模式中对经济与政治理论的侧重，格伦德曼着重发掘了马克思的自然和技术思想。作为人与自然交互中主体性的一方，生态问题的解决显然要从“人”这一侧寻找答案，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为生态问题的评估找到合理的参照点，并且创造性和公共性的人性特征是所有技术思考无法脱离的起点。

有赖于格伦德曼对马克思文本“分析式”的阅读，传统解读模式中对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带有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前理解”很大程度地排除了。格伦德曼没有将技术史只理解为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表现，而是看到了作为生产关系的技术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与活劳动的分离与对立关系，这一过程源于技艺从工人向机器的转移。马克思的关注集中于机器作为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与固定资本，和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规训与控制问题。而格伦德曼在这种技艺的转移中发现了技术的自主化倾向与不透明性增加的双重过程——技术似乎变成了具有独立性的，可以自主“进化”的系统，而随着技艺的积累，内部单元愈发复杂、耦合愈发紧密，加之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分工，技术也愈发难以被人理解与控制：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我们根本无法要求操作者懂得面前仪器的某项数字的升高是出于核动力学的何种原理，或是复杂的技术实现过程中的哪里的设计出现了错误，洋洋洒洒的操作手册也只负责说明日常的设备应用。当代一切技术不外如是，于是“意外”变为了“必然”，也变为了“常态”。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正是技术世代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分离，被受到异化的技术“自身”的逻辑统治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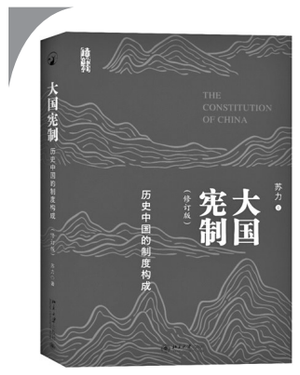
就此，格伦德曼提出了借助系统理论重建以技术异化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基本立场，技术的这种自主化倾向也要求我们考察技术“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用经济系统或政治系统的第一性视域理解技术，将一切技术问题都以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来进行解答。技术在社会分化的巨大驱动力下变成具有独立性，有着自身的“逻辑”，可以自主“进化”的系统，因而脱离了自然、脱离了人性需要，朝着一种异化的方向滑去，或者说这种自主性正是技术脱离社会掌控的表现。这是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读到拜物教理论在技术领域的论证与表达。在格伦德曼看来，只有消除或减少异化才能够使得社会系统得以控制它们的环境（该书中主要指技术）。

马克思将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社会称之为理性社会，而卢曼所说的社会系统理性化，在作者的理解中就是：不存在因异化而导致的遮蔽与失控。所以，最大程度地消除技术异化和异化的根基，是技术世代生态问题的最根本解决方案，它与人类朝向（重新诠释的）共产主义的计划相重合，并将随着人类的自由解放（其中包括人类掌控自然的能力达到顶点）而得到极大的改善。

历史经纬，理论纵横

关键词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张玉琢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修订版）苏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版/96.00元/ISBN：9787301348338

历史中国何以在诞生之初即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如何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其中潜藏了哪些法学和政治学上的道理？这些正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笔名苏力）悉心研究的课题，于是有了《大国宪制》及其2024年修订版。

在该书中，作者将历史中国的大国建构划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次。齐家主要指通过对纵向的父子长幼关系和横向的男女两性关系的规制，完成村落共同体层次的组织；治国是在特定自然条件和外部族群压力的背景下，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分封制出发，借助军事架构、经济财政、语言文字、人才选拔建立起更大政治体系；平天下则是在治国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展的结果，它使得历史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大一统而又富有制度多样性的国家。

上述分析中，作者所调用的理论资源，可大致分为三类：历史学提供了该书的主要研究素材，作者尤其注意出土材料与传世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间的对照，就每一重要问题，又都留意其学术史；政治学提供了该书的一部分关键思想资源，中国的先秦诸子，西方的古典时代、启蒙时代诸哲，乃至近现代中外重要政治思想家，参差互见；作者所专精的法理学，决定了该书主要的学科定位，法社会学的色彩尤为浓厚，该书因之对一般社会科学理论持相当开放的吸纳、借鉴态度。全书的写作，贯穿着实用主义、功能主义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力求从宪制的实质功能而非价值判断的角度分析其得以建立、维系乃至被取代的缘由，希望充分揭示中国数千年传承历史、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及其对人类制度文明的独到贡献。

《大国宪制》不只是一部学术力作，也是作者的一次面向公众的真诚讨论。自1992年任教于北大法学院起，法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法经济学的知识资源，独到且犀利的视角，通俗而又精彩的修辞，为苏力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所有这些元素也都蕴含在该书中。语句直击要害，修辞生动传神，术语避免铺陈，引用干脆利落，作者的文风保证了该书的可读性；鲜活贴切的事例，不拘一格的表达，真诚讲述的态度，让普通读者对该书涉及的理论问题少一点望而生畏，多一点亲切入耳，和作者一起思考、探索。该书的修订改版也自始至终坚持这种读者友好的原则。修订版较之初版，版面字数约增3万，进一步完善了观点表达、核订了史实和资料。有的页面，初、复审编辑只改一两处，而作者又自行修改达20处。作为修订版的责编、同时也是最早的读者之一，我从该书中获益匪浅；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该书的若干结论，我都由衷希望大家能享受阅读的过程。